

李大钊演讲《庶民的胜利》



李大钊《庶民的胜利》背后的故事：预示一个伟大政党即将诞生

“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当一个庶民，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当一名工人。诸位啊，快去做工了！”一位身着长袍，带着椭圆眼镜，留着八字胡的中年人，正在激情洋溢地发表着演讲，他振聋发聩的呼喊，让观众瞬间“穿越”回1918年11月的北京天安门前。

2017年11月27日上午，“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”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启动。在《伟大开端——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》展览中，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记者编辑表演的“忠诚与信仰——情景党课”引发关注，《信仰的味道》、《庶民的胜利》、《民众的大联合》三个现场表演片段，引领观众一同追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启的伟大征程，激励党员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永远奋斗。

当日，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“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”展区，李大钊的扮演者正在进行著名演说《庶民的胜利》。1918年，这篇演说和李大钊的另一篇文章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刊登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面。李大钊满怀信心地预言“试看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”。

李大钊发表的《庶民的胜利》一文在

当时影响非常大，不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，同时也预示着一个伟大的政党即将诞生。

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

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乐亭县，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，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，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。

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，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，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。

彼时的中国，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。仁人志士都在思索，中华民族的路在哪里？中国人民的明天在哪里？

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，使苦苦探求中国未来道路的李大钊备受鼓舞和启发。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，也是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。他热情地赞扬十月革命，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“新纪元”，中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。

因此，李大钊在一把淡黄色的藤椅上写出了《庶民的胜利》、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等著名文章和演说，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，表达他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求索与呐喊。李大钊牺牲后，他的夫人赵纫兰将这把藤椅从北京运回故乡。如今，这把陈旧藤椅安放在位于乐亭县大黑坨村的李大钊故居中。

五四运动爆发后，李大钊又是在这把藤椅上写出了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，成为

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。

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1918年11月，李大钊在天安门前发表了著名演说《庶民的胜利》。

毛泽东在天安门前聆听李大钊演说

1949年3月，毛泽东在西柏坡回忆时曾动情地说：“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奔波，吃了不少苦头。还不错，在他的帮助下，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……没有他的指点和指导，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！”

而李大钊的《庶民的胜利》演说对毛泽东更是有着深刻的影响。

这是因为1918年11月，李大钊到天安门前演说《庶民的胜利》时，毛泽东就是现场听众之一。

1918年夏天，走出湖南第一师范校门的毛泽东来到北京。毛泽东回忆第一次到北京的原因时说：“是夏（1918年6月，毛泽东一师毕业），我决定到北平（那时叫北京）去。当时，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……在出国以前，这些青年预备先在北平读法文。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，在这一群留学生中，有许多是湖南（第一）师范学校的学生……我陪了几个湖南学生到北京去。”

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是为了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。“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，所以一到就得找事。那时，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（昌济）在北



风竹图

李方膺，中国清代画家、官员，为“扬州八怪”之一。为官刚正不阿，廉洁爱民。与李鱣、金农、郑燮等往来，工诗文书画，擅梅、兰、竹、菊、松、鱼等，注重书法传统和师法造化，能自成一格，其画笔法苍劲老厚，剪裁简洁，不拘形似，活泼生动。有《风竹图》、《游鱼图》、《墨梅图》等传世。

名画欣赏

“现代小说大师傅陈忠实”

作家轶事

1993年8月，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在西安上市时，当地一家新华书店约陈忠实为读者签名售书。为了扩大影响，他们还还为陈忠实做了一张精美的名片，准备随书赠送给读者。

签名售书的前一天，新华书店经理“签名建设亲自登门拜访陈忠实，将名片的样品给陈忠实看过。陈忠实拿过名片一看，只见上面赫然印着“现代小说大师陈忠实”几个字。

陈忠实拿起一支笔，然后对严建设说：“严经理，我看这个名片需要改一改。”“严建设疑惑地问道：“陈老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陈忠实用毛笔指着名片上的头衔

说：“我不是大师，这不是谦虚，是远远不及大师的格。”说完，陈忠实在“大师”两个字的后面，加上了一个“傅”字。“陈老师，这个字加上去，很土气啊。”严建设看了改后的名片说。陈忠实解释道：“严经理，我只是写了一部读者勉强能接受的小说，怎么敢称‘大师’？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写字的大师傅罢了。如果就因为一点小成就就给自己戴上不合适的帽子，不仅仅我自己不舒服，后人也会笑话我们的。所以，这张名片必须改。”

第二天，读者们每人都收到了一张印有“现代小说大师傅陈忠实”的名片。陈忠实在名片上只加了一个字，却将一位作家的态度深深印在了读者的心里——虔诚与谦逊，才是最美的名片。

（源自《人民政协报》）

把时间“浪费”在阅读上



读书上的“浪费”实则是珍惜，珍惜知识的可贵，珍惜时间的可贵，珍惜思想和内涵的可贵。

有没有这种体验？几排高大沉重的、散发着木料味道的书架伫立身旁，干净的书桌上摆着几本书，随意翻翻看看，间或在纸张上写点什么，一转眼，天就黑了。半天时间过去，人像从长梦中醒来，有种很恍惚的感觉。

这不是白白浪费了半天的时间吗？

要知道，半天，是可以乘高铁从一座城市到达另一座千里之外的城市，或者飞往另一个奇异的国度饱览山河。

把时间浪费在读书上，不但乐此不疲反而近似痴迷。究竟是什么让我把生命的脚步放慢？如果非要让我回答这个问题的话，我想无非就是那句你早已经历过的话：读书是拓宽生命宽度和拉长生命长度的最好办法。与古代先贤对话，正着或倒着审视他们的人生轨迹，与遥远未来对视，想象难以想象的日月星河，这种如梦如幻的体验，是不读书之人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读书是伟大的，是神圣的，是值得浪费一些时间的。

在我看来，读书，习惯性地沉醉于

书中就好比隐居山林，避开了世俗的纷争、喧嚣和无聊，独享着一份令人偷悦的属于精神的大自然；读书也好似奔波之人归隐田园，独享着纸张和文字赐予的恬之静，静之美，美之醉，丝毫不觉得孤独和寂寞。

读书时，即使身居陋室，你也可以感受溪边垂钓，抑或在林中小憩，抑或在月下独酌。把时间浪费在读书上，“浪费”一词便有了全新的解释。看似在浪费，看似一无所获，看似格格不入，实则心满意足，比吃饱喝足更舒服。人生苦短，该做最舒服的自己。

与快节奏的人群拉开距离，我依然保持着害羞、好奇、天真和任性，依然觉得读书是和自己对话，关照自己内心所需的最好方式。不急功近利，不舍本求末，不随波逐流，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应该具备的，我要做一个有思想的人，而不是为别人活，活给别人看的人。

有些时间就是用来浪费的，而不是紧绷绷的，急促促的，它和奋斗，和只争朝夕并不矛盾。读书上的“浪费”实则是珍惜，珍惜知识的可贵，珍惜时间的可贵，珍惜思想和内涵的可贵。

把时间浪费在读书上，不做好看千篇一律的皮囊，做有趣的万里挑一的灵魂，取悦自己。

把时间浪费在读书上，做一个修养深厚，言之有物，格调高雅的人，那是一个人永恒的魅力。

（源自《经济日报》）

唐代的诗酒文化

中国酒文化
酒文化包括酒的制法、品法、作用、历史等文化现象。这种文化现象具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特征，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。早在夏朝开始，饮酒便作为一种固定的习俗出现在我国传统文化形式当中，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为我国的“酒之源”。此后经过不断发展，于唐代达到顶峰。

唐代的诗酒文化

众所周知，唐朝是诗歌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，在诸多诗歌作品中不乏与酒文化相关的作品。不少文人雅士把酒作为自己创作的素材，亦或是激发自己创作灵感的源泉，来营造一种浪漫的创作氛围。如诗仙李白便善于饮酒作诗，其酒后的作品如奔涌的长河滔滔不绝，杜甫曾称其“李白斗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”。在他的诗作中亦可见诸多酒文化的内涵，如他《赠段七娘》中写道“千杯绿酒何辞醉？一面红妆恼杀人”，其中的“绿酒”便是古时対酒的一个别称。除了酒对诗的影响，诗人也用自己文采斐然的绝丽诗句为酒文化披上了华丽的外衣，使诗与酒相得益彰，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经典——诗酒文化。

唐代与酒有关的诗句

唐诗的数量之多以及质量之精在我国古代文



风

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，门里窗里任它出进，轻云附着它浮动，水面被它偎着，也柔和地让它揉搓。随着早晚的凉凉、四季的寒暖，一阵微风，像那悠远轻淡的情感，使天地浮现出欢喜不同的颜色。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。这般高兴，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。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，有时候润润的带着温柔；有时候亢爽，有时候凄凉。谁说天地无情？它只微微的笑，轻轻的叹息，只只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。因为一放松，天地便主持不住。

假如一股流水，嫌两岸缚束太紧，它只要流、流、流，直流到海，便没了边界，便自由了。风呢，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，却没

法儿解脱它。放松些，让它吹些吧；树枝儿便拦住不放，脚下的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膀来阻挡。窗嫌小，门嫌狭，都挤不过去。墙把它遮住，房子把它罩住。但是风顾得这些么？沙石不妨带着走，树叶儿可以卷个光，墙可以推倒，房子可以掀翻。再吹些，树木可以拔掉，山石可以吹塌，可以卷起大浪，把大块土地吞没，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儿扫个干净。听它狂啸狞笑怒吼哀号一般，愈是阻挡它，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。谁还能管它么？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，天上的云压近了地，太阳没了光辉，地上没了颜色，直要把天地捣毁，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。

文坛名家

蒋子龙：『生活就是最好的小说』

和记者见面这天，蒋子龙格外繁忙。有一场谈读书的沙龙等着他，紧接着是一场面对大学生的讲座，主题是“文化”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记者：“我订了一份光明日报，是你们的读者。光明日报一直很认真地研究着一些学问，没有跟风地去炒‘热词’，这很可贵。在媒体转型的当下，希望光明日报坚持下去，给纸质媒体光明。”

面前的蒋子龙，看不到“传说”中的批判、执拗和愤世嫉俗。他热情、亲切，乐于倾听，认真思索，表达诚恳。长期关注着急剧变化的社会，如今78岁高龄的蒋子龙依然保持着创作的状态。

在写小说之外，蒋子龙还致力于杂文与散文的写作。杂文是针砭丑恶、张扬美善的文体，讲究的是观点鲜明，短小精悍，刺刀见血，这种干脆利落，是非分明的文体，与蒋子龙的性格简直有着天分的契合。农村的城镇化、城市的工业发展，环境的污染与保护……这些都是他杂文的题材。

“年纪越来越大，锐气没有了。60岁之前，我想写，很快就能写出来。现在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写得少了，但看到一些现象和信息，脑子里常常会冒出很多感受和思考，所以写的散文和杂文多。”

谈起长篇，蒋子龙有些压力，不过他觉得，搞文学创作，一定还是要写长篇的。蒋子龙的小说多涉及现实，他说：“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最好的小说”。

2018年年底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表彰的百名改革先锋中，蒋子龙是唯一健在的作家。

蒋子龙的成名作是工业题材小说，这依然是生活赋予他的。

1975年秋天，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召开，天津重型机器厂是一机部所属的大厂，蒋子龙作为该厂的代理工段长参加了会议，就是在这个会场上，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主任找到蒋子龙，希望他能作为《人民文学》写一篇小说。蒋子龙正被大会上一些先进人物的事迹所感染，于是就在开会的宾馆里，没日没夜地写了起来，短篇小说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由此诞生。

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小说的主人公霍大道，原型就是蒋子龙所在的天津重型机器厂厂长冯文彬，以及蒋子龙在会议期间了解到的南京汽车厂的一位副厂长。蒋子龙运用文学的手法，把两个原型人物的人格与事迹揉搓成了霍厉风行“抓生产”的霍大道。现在再读这篇小说，小说中随处可见蒋子龙对工人渴望发展生产的愿望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状态。

1979年，蒋子龙又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了短篇小说《乔厂长上任记》。“蒋子龙”这三个字，从此烙在了当代文学的史册上。

《乔厂长上任记》讲述了“文革”后，某重型电机厂生产停顿，人心混乱，老干部乔光朴主动出来收拾烂摊子，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，从而扭转工厂被动局面的故事。小说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光辉形象，被认为是“改革文学”的开山之作。当时，蒋子龙只花了三天时间，就写出了这篇名作。但“乔厂长”这个人物，在蒋子龙的心里已经描摹了上百遍。后来，在不同的场合，蒋子龙都会被人评价为“改革文学”的开创者。每当这时，直爽的蒋子龙常说：“其实我至今也搞不清楚‘改革文学’的概念，作家是不可能按照‘改革’的定义去创作文学作品的。而只有当‘改革’剧烈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时，才能让作家有激情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。”

蒋子龙始终认为，现实生活永远大于文学艺术，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坛，现实题材的创作都不可或缺，文学作品只有符合生活真实才能存在。

回顾蒋子龙的学生生涯，他的几乎每一篇作品问世，都会引起社会上的一次甚至数次争论，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，蒋子龙的文学创作就在这样的一次次锤打与磨砺中走向成熟。他感慨道：“磨砺总是最具积极意义，走过那样一段漫长而坎坷的文学道路，回过头去看如同一次远游，一个远游的人归来，总会有故事可说，于是就又写下来了，仍然还是有是非，还有风波，写作成了保持做人尊严的手段。”

蒋子龙把他的文学观念，牢牢地定位在了“真实”两个字上：真实的世界，真实的困难，真实的人物，真实的感情……尽管真实并不总是讨人喜欢，但人们却无法逃避它，只能正视它，聆听它。蒋子龙说：“我相信，任何读者的心，都能够向真实打开。”

（源自《光明日报》）

新作简介

扶贫题材长篇小说《雪莲花》 展现新时代“山乡巨变”

长篇小说《雪莲花》日前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该书作者以扎根藏区十五年的一线扶贫经历为创作素材，讲述了一个真实生动的扶贫故事，全景式展现了高原藏区脱贫攻坚的壮阔画卷。

据了解，该书作者江觉迟从安徽来到川藏高原支教、帮扶十五年，创办了草原孤儿学校，给草原孤儿、贫困孩子、失学儿童提供基本的照料和教育，扎根藏区十五年来，除了办学，她还利用假期和家访时间，深入藏区偏远山寨，针对特困家庭进行摸底排查，直接参与了当地政府开展的脱贫攻坚工作。

《雪莲花》以作者亲身经历为创作蓝本，讲述了主人公朵采从内地来到藏区支教、帮扶，在生存环境极为艰苦的深山草原，一边办学一边投身于当地的扶贫工作。小说既描绘了川藏地区的乡土人情，也塑造了一批带领藏区人民脱贫攻坚的扶贫干部形象。

日前在京举行的《雪莲花》出版座谈会上，专家认为，该作品聚焦脱贫攻坚主题，是一部在时代洪流中应运而生的优秀长篇小说，也是一部描写今天藏区发展、脱贫致富的“新时代的《山乡巨变》”。小说以文学的笔法，生动展现了文化扶贫、教育扶贫、产业扶贫、易地扶贫等脱贫攻坚重点工作，反映了新时期藏区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善。

（源自新华网）

